



中世纪的 欧洲大学

(第三卷)

——博雅教育的兴起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邓磊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G649.509

2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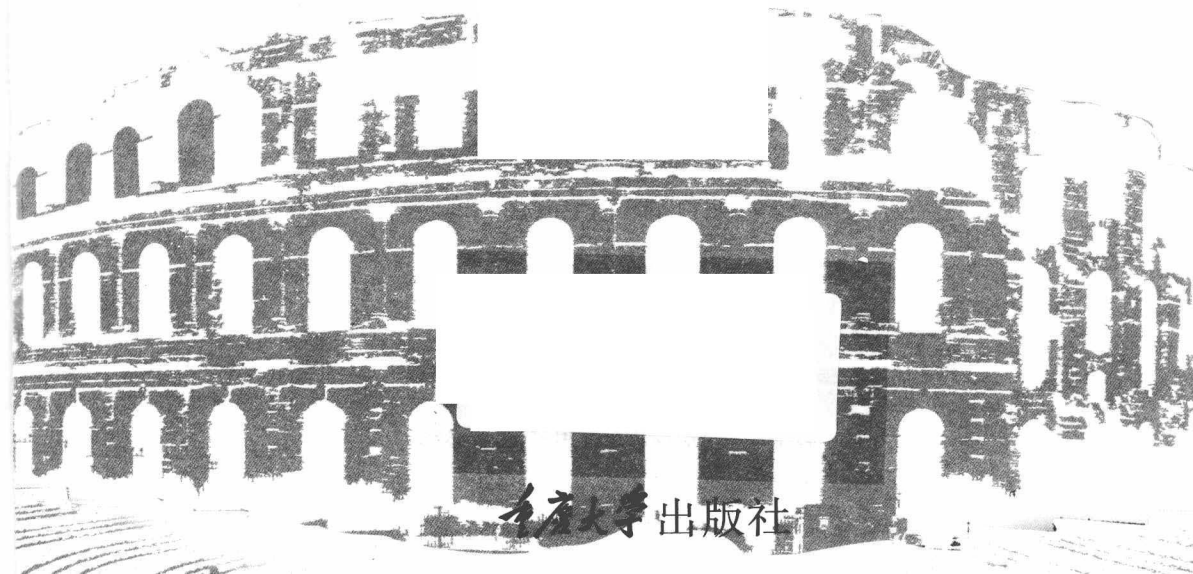
中世纪的 欧洲大学

——博雅教育的兴起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邓磊 译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博雅教育的兴起/(英)拉斯达尔(Rashdall, H.)著;邓磊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2

(“大学:思想与制度”书系. 第1辑)

书名原文:The University in the Middle Age

ISBN 978-7-5624-5941-5

I. ①中… II. ①拉…②邓… III. ①大学—研究—欧洲—中世纪 IV. ①G649. 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4838号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博雅教育的兴起

海斯汀·拉斯达尔 著

邓磊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责任编辑:雷少波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19.25 字数:259千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5941-5 定价: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拉斯达尔在本书初版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断言：“牛津（或许）不久后将因为无法令人满意地呈现一系列完整的早期历史文献以供研究，而终结其作为世界上几乎最重要之大学的历史。”同时他还认为，“此项工作只能由大学自己来完成，因为对于其他一些私立的社团来说，该工作实在是太过于宏大了”。事实上，自写下这些文字以来，拉斯达尔已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来消除类似的文字所传达出来的对大学的责备。但最初对此种责备做出回应的却是一个私立社团——牛津历史学会，并且迄今为止，该社团所完成的工作更像是为一位学者——索尔特（H. E. Salter）博士的学术成就致敬。时至今日，关于牛津中世纪的历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当拉斯达尔进行《中世纪的欧洲大学》这部巨著的写作时，其更多依赖的是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 d. 1611）与布莱恩·塔恩（Brian Twyne, d. 1644）等人的历史笔记，对于其他新出版的文献资料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利用。中世纪的法令以及一些存世的早期主教纪录，基本上构成了研究中世纪牛津大学史的唯一资料来源。在拉斯达尔著述此书时，这些文献正在影印。但正如拉斯达尔所提及的那样，在《牛津学术规范》还没有编辑完善的时候，对该大学中世纪历史之研究的确困难重重。幸好现今这个缺陷已经被弥补了——斯特里克兰·吉布森（Strickland Gibson）先生对早期大学章程的梳理，以及索尔特博士对牛津早期注册名录的还原，已经尽善尽美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与此同时，拉斯达尔也很好利用了这些最珍贵的资料。在罗宾逊（Robinson）的学院通史系列尚未出版之前，牛津各学院一些独立成册的专论也已经从1898年开始，在此后半个世纪中基本上都以传记的形式



展开了此项工作。

在牛津篇章中，拉斯达尔再一次展示了他在中世纪大学研究方面持之以恒的勤奋以及相当卓越的洞察力，尽管面临着诸多不便，拉斯达尔依然始终保持着对牛津研究的新鲜感，体味着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拉斯达尔的著作中有一些内容属于原创性的阐发，但他并没有像对待德尼弗勒(Denifle)后来所作的贡献那样给予这部分内容以同等程度的关注。事实上，德尼弗勒在自己的著作中只用了20页左右的篇幅来阐述拉斯达尔提及的问题，并且也从未声称自己对牛津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直至1886年，在麦克斯韦·赖特(Maxwell Lyte)爵士——一个精明干练的牛津历史档案保管人——手中，牛津大学史才开始成为一项独立的研究。起初，拉斯达尔并未打算将这部著作处理成有关中世纪大学史细枝末节的记录，他所希望的是，用现代的眼光对过去的历史做出一些新的阐释。拉斯达尔强烈地意识到，有关大学历史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忽视比较方法的应用。因此，在对待牛津的历史时，拉斯达尔将其置于整个欧洲的大背景下，作为三个最原初的大学模型之一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寻踪觅迹，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勾勒出牛津大学组织结构的进化图景。拉斯达尔开创的这片新学术领域没有继任者，而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也无须有人追随。

或许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感觉到拉斯达尔的结论仍然还有推敲的余地，但必须承认，拉斯达尔对于牛津历史的研究在整体上总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对于牛津作为学术中心之起源与发展的论述，拉斯达尔有两个重要观点曾被学界质疑。首先，根据拉斯达尔的观点，巴黎与牛津之间是可论证的“母女关系”。他确信牛津的发展必须要从巴黎大学的迁移事件中来寻找源头，并且确信那个所谓的“迁移事件”大约发生于1167年，由于亨利二世施行的一则政令——剥夺英国人为滞留法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提供的供养——所造成的后果。此观点的标新立异性令拉斯达尔在《学园》(*Academy*)杂志上介入与托马斯·厄斯金·霍兰(Thomas Erskine Holland)爵士的争论。^①拉斯达尔对这一观点的坚持以及在其著作中煞费苦心的精心论证，招致了其他学者的批判。默林杰(Mullinger)在一篇评论性的文章“英国历史

① 详见正文。

评论”^①中认为：如果按照拉斯达尔的说法，巴黎与博洛尼亚直到1170年才开始崛起，而牛津又是巴黎于1167年迁徙而来，这样岂不是“拉斯达尔口中的女儿反而比妈妈出生得还要早”？但拉斯达尔始终坚持牛津大学迁移说，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激烈地回应了上述言词不当、颇具挑衅的抨击。^②或许可以认为拉斯达尔有关迁移论的说法并未得到现有证据的支持，但我们决不可因此而忽略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早期大学发展的历程中，巴黎对于牛津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一观点，我们不仅要坚信它的正确性，同时还应当对影响产生的外延与内涵做出持之以恒的全面探讨。但在将自己的注意力定位在巴黎对于牛津历史的重要影响之后，拉斯达尔却没有对英格兰知识活动的发展给予足够的论述空间。这的确令人遗憾，因为沿着这一线索理所应当能够一路追溯出同时期催生巴黎大学的种种历史线索。默林杰将拉斯达尔的这一态度描述为：“一种决心通过实证而尽可能地割裂大学与对其文化有所鼓舞的宗教精神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二者作为本质上敌对的双方展示出来。”这种说法肯定歪曲了拉斯达尔对牛津起源问题的研究。拉斯达尔的确排除了一切于宗教学园发展出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大学的发展不会在“任何时候依靠任何牧师会或修士会”。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也否定了宗教对大学一些富有成效的贡献。但如果考虑到那个短命的学术机构——“圣乔治城堡公会”——长期研习圣经正典的学术活动而作出的贡献，我们就会发现拉斯达尔的确忽视了宗教机构对于牛津大学产生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寻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来观察牛津学院早期历史之前，我们似乎更应当对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一个世纪的英格兰智识复兴进行全面的 research。

关于寄宿制度的发展——原来的牛津厅堂(halls)与剑桥宿舍(hostel)，拉斯达尔坚持认为这些小型学术居所应当起源于一些在校学生社团。这些常驻学校的学生们长期以来都以俱乐部的方式有目的、有组织地聚集在一起，并委派其中的一员负责处理与房东的租赁事宜。拉斯达尔认为，屋舍与寝室具有原发的民主性格以及年轻化的管理方式。有人也曾质疑拉斯达尔的这一观点是否能够得到当前史料的支持，但即使无法证明拉斯达尔的观点符合历史的真相，我们仍

① E. H. R. ii(1896), p. 783.

② 详见正文。



有充足的理由来感激他在中世纪大学管理问题上所提出的“年轻化”理论,以及其他原发性的论点。事实上对于早期牛津的学生社团,人们长期以来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景象:在牛津的管理系统中,学术事务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年轻的毕业生和教师手中。对于这一观点我们有着极为可靠的证据,例如阿伦德尔大主教(Bishop Arundel)因视察学校受到阻挠而向国王亨利四世抱怨的事件,正是因为一伙在校学生的抵制而出现的。以人文学院员工与其他教职员工以及在牛津学习的神职人员的关系为标志的循环往复的争端是对于一种记忆(年轻的研究生、毕业生在集会中形成了一个多数派团体,并左右校长以及代理人的选举)的较好理解方式。

拉斯达尔小心翼翼地解释:碍于时间的限制与距离的遥远,他不得不有意识地放弃从一些侧面来探寻牛津大学历史的尝试。如果这是一种暗示,那么其似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提示我们,一些有关牛津历史的并发研究曾经发生或者正在进行。拉斯达尔在大学与教会关系的篇章中,只是将自己的研究限于大学的组织结构和法令章程,却并未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关注大学的发展对教堂高层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由于中世纪牛津公会谱系的问世,引起学界对于英王亨利三世统治期间英格兰基督教教区排序情形的热切关注。玛莉安·吉布斯(Marion Gibbs)女士曾对当时的教区职员进行了调查,并试图为78位英格兰主教进行等级排序。总体而言,这78位主教的资料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亨利时期的主教仅有8位拥有修士身份;有42位形成了一个“高官与权贵”集团,其中22位是普通法官,受任于中世纪国王法庭的某个部门;有14位似乎曾跻身于最高权力机构,并曾在巴黎或牛津的学院呆过一段时间。第三个团体拥有40位学术权威,而其中的30位被标注为“学术经历曾作为被升职的因素,或者对其生活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所有人员中,大约有半数在成为教区主教之前都有过作为大教堂职员从事教区工作的经历。第四个团体是由教区主教和大教堂神职人员组成,而他们之中似乎只有6位既不曾是学术权威,也没有做过法官。在亨利三世之前的英王统治期间,英格兰的主教们皆是从修道院、大教堂或者宫廷内部擢选而来。不过到了亨利三世时期,牛津人开始在主教群体结构上显示出强大影响力。1234年,随着阿宾顿的爱德蒙德(Edmund)教授被任命为坎特布雷大主教一职,年轻的牛津大学的声誉攀升到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有史以来,牛津之子首次站立在全英格兰

一个万众瞩目的位置上。吉布斯女士写道：“从此以后，牛津人获得擢升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其中包括格罗斯泰斯特 (Grosseteste) ——曾与埃德蒙德一起被誉为对牛津各学院声望最具影响力的院长，以及他们的年轻同事和学生们：拉尔夫·梅德斯通 (Ralph Maidstone, 后升为赫里福郡大主教)、理查德·维查 (Richard Wych, 后升为齐切斯特大主教)、瑟万·博韦尔 (Sewal Bovill, 后升为约克郡大主教)，以及后来的首相、高级教师罗杰·威瑟海姆 (Roger Weseham, 后升为考文垂及利兹主教)、著名医师尼古拉斯·法纳姆 (Nicolas Farnham, 达勒姆主教) 等。随着牛津诸学院的声誉不断攀升，其他公会的主教也就理所当然地开始趋之若鹜。简而言之，牛津，俨然成为亨利三世时期一些最具声望的主教们的知识之家。在其他令人满意的尝试能够证明更加有效之前，有关此类的工作应当大力推行，以推测中世纪英国在大学中招募神职人员的状况。

当笔触延伸到 15 世纪的时候，拉斯达尔倾向于将牛津精神的彻底沦落归结为阿伦德尔 (Archbishop Arundel) 大主教所采取的一系列根除一切威克利夫主义 (Wyclifism) 苗头的措施。拉斯达尔和其他著作者们似乎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牛津在改革前的一个世纪进入沦落时期的观点，这种必然的沦落，大家一致认为正是其曾作为威克利夫主义异教渊藪的惩罚。而对于牛津在 15 世纪沦落的假设，显然是出于对阿伦德尔大主教开始巡视大学所产生影响进行的夸张。事实上，造成 15 世纪期间牛津在校生数量锐减的原因内外兼有，并且两者所起的作用应当是不相上下的。该时期关于大学氛围的理解应当放在整个欧洲的教堂环境以及当时英格兰牧师们所面临的特殊情形的本质问题上加以探讨。1417 年齐切利大主教 (Bishop Chichele) 在教士会议上就毕业生们无法获得圣俸的增加一事进行了探讨，而在此之前来自大学的抱怨就反映出牛津在一些事务处理上的不负责任而造成了不理想的状态，这也成为导致学术研究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博闻强识的托马斯·加斯科因 (Thomas Gascoigne) 曾在 1442—1445 年任牛津校长，在他所著的《箴言书》(*Liber Veritatum*) 中散缀着对英格兰教堂滥用自身声望的谴责，而并非是对大学自身的批判。因大环境的模糊性，我们难以对该时期大学与学院进行学术研究遇到的困难进行全面调查。或者，在此时期的学术研究概况能够成为一门研究学科之前，我们无法为牛津在 15 世纪的堕落做出一个最终的裁决。但是与此同时，金斯福德 (Kingsford) 所做出的结论或许能够给予我们一些

慰藉。金斯福德论述到，“牛津大学，绝不会在事实意义上消亡，它为整个英格兰服务，并且诞生了托马斯·贝克顿(Thomas Bekynton)、威廉·维恩弗里特(William Waynflete)、约翰·默顿(John Morton)以及约翰·罗素(John Russell)等杰出人士，他们无不将自己的进步首先归因于自身的德行与贡献，而非任何先天的机遇；他们无不在这所大学里贡献了他们的教学和管理，无不将自己后半生的兴趣致力于学术研究，并以务实勤恳的姿态表达了他们对这所学校的感激。”

拉斯达尔似乎感到自己有义务通过早期并不充足的史料，来界定对几乎整个15世纪牛津课程设置的理。他的论述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此时期的大学章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资料来源。其中之一就是默顿学院的《编年注册纪录》，这是现今仅存的关于此方面的纪录，编订者为索尔特博士，他的工作对中世纪末期大学章程提供了很好的补充。另外一个则是阿斯赛市立博物馆收藏的一本日记手稿，撰写者为里特(A. G. Little)与佩尔斯特(Pelster)两位博士。这本手稿为我们提供了1280至1290年期间，牛津与剑桥神学院一些极具价值的史料。佩尔斯特博士富有洞察力的介绍，为后人对两所大学神学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教师招募途径的全面研究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描绘中世纪大学历史的工作中”，索尔特博士指出：“我们的危险在于过高地估计学院的重要性。”拉斯达尔之前的作者，如塔恩与伍德(Wood)等，都曾过于自信地认为自15世纪末期以来，学院建构就显著地出现在大学章程以及社群生活中，并且此种观点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赫伯特·马克斯韦尔(Herbert Maxwell)爵士大概是现代历史学家中第一个对此谬论加以关注的学者：在其《1530年前的大学》一书的序言中，他提醒自己的读者“不要跟随那些普遍流传的谬论而理所当然地将学院理解为大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他颇为无奈地澄清，在书中涉及的历史阶段，英国学院的历史几乎不对大学的大历史构成多少真正的影响。尽管拉斯达尔认为“英国学院史研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使得他对此方面倾注特别的心力，但在对于中世纪大学的研究中他并没有夸大学院地位，而是恰如其分地进行了论证。由于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在世人的眼光中已经被视为学院制度的代名词，以至于我们被告知许多学院的存在原初并非指向本科生的培养，而是协助那些因冗长的课程设置而无法获得文科学士学位或者无法进入更高学习阶段的天才的时候，仍然会感到十分的惊诧。事

实上,能够从学院所提供的便利中获益的学生是非常有限的。根据索尔特博士的估算,15世纪中期的牛津大学应当拥有6个学院,其中女王学院与林肯学院都提供了8个入读学生名额,奥里尔学院大约是12个,默顿学院大约是24个。中世纪大学一般意义上的本科生之家应当是他们的屋舍,以及他们经常驻足的学院教导场所,或者是由学院管理者们租的讲演教室。新学院的建立改变了这种状况,该学院不仅被设计成讲座教学的场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是被作为学生屋舍修建的。索尔特博士甚至更为大胆地断定:截至1450年,牛津大学各学院可能已经全部走上讲座教学的道路,此时它们已经和大学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了。若果如其然,同时考虑到它们在大学整体机构下所处的位置,那么我们应当毫无怀疑地宣称学院机制为牛津大学获得学术中心的声誉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中世纪默顿学院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它证明了学院制度的建立为学院成员进行学术研究扫清了客观上的障碍。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学院教职员们之所以呆在牛津并非皆出于对学问的热爱,而是使自己能够在大学之外获得提拔升迁的知识资本。

拉斯达尔在其关于牛津的叙述篇章中试图暗示这样一个事情:牛津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的地位,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使得他对于这所大学组织构造的论述变得与众不同。拉斯达尔所涉及的许多有关中世纪牛津大学的论述,在其他相关的著作中都被极大地忽视了。当拉斯达尔开始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里特博士已经在他的由牛津历史学会1891年出版的《牛津的灰衣修士》一书中开创了一种极富创造性的写作手法。然而英国学者的反应却不够灵敏,对这一写作手法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承继。只有哈里斯(C. R. S. Harris)博士的《邓斯·司各托》、夏普(D. E. Sharp)博士的《13世纪牛津大学的圣方济各会哲学》以及斯蒂尔(R. Steele)博士对于罗杰·培根(Roger Bacon)著作的编辑算是难能可贵的例外。我们在中世纪牛津学者活动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优势主要应归功于海外学者的贡献——如鲍尔(Baur)、切努(Chenu)、杜海姆(Duhem)等。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工作使得牛津诸学院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但在牛津作为中世纪知识中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得到正确对待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拉斯达尔认为在其笔触探及学术史之前,他对牛津的体制研究是缺乏特色的。或许拉斯达尔在此方面进行的尝试仍显仓促和草率,然而却有助于提起人们的兴趣,去研究一个被长期忽略

的主题。令人遗憾的是，拉斯达尔在进行该项工作的尝试时并没有指出此种论述方式存在的困难——尽管在该领域内一些重要的工作已经开展，这些困难，依然是存在着的。事实上，拥有在大学之间自由流动的学者，以及那些日期不明的存世著作并不能理所当然地作为一种特定学术地位的象征。譬如，牛津大学可能声称自己曾经是邓斯·司各托^①学习和教学的第一母校而理应得到世人的膜拜。但是剑桥、巴黎以及科隆同样也是司各托以教师身份工作过的地方。当前关于邓斯·司各托学术生涯的研究成果依然十分有限，关于他全部著作的名单仍然没有被甄别出来，而能够确切地归于他本人的活动年表也依然扑朔迷离。鉴于以上缘由，当我们在最近两部同样源于牛津、同样是对邓斯·司各托的教学生涯进行研究的著作中，却发现它们对司各托与牛津前辈以及同时代人物之间的关系说法不一的时候，也就无需过于惊诧了。在上述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之前，许多耐心的调查工作需要循序展开，如近年来一些关于邓斯·司各托学术生涯新证据的陆续发现。在有关牛津大学在经院思想中所处地位的评价过程中，拉斯达尔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限定在五位杰出学人——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罗杰·培根、邓斯·司各托、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cam)和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等——的成就上。而后续的研究表明，如果想要在多重角色和更大范围内厘清牛津对于中世纪知识发展的贡献，将其他较为次要的人物纳入我们的视野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拉斯达尔因对剑桥篇章的描述过于简略而遭致诟病，而他在事前也预先估计到了将会面对的批评。他写道：“我恐怕可能会遭受一些批评，认为我在描述诸如剑桥这样伟大的一所大学时竟如此不敬地简略处置。但事实上，我的确几乎无法找到更多有用的东西，从而能够像描绘牛津那样来叙述剑桥。”除非拉斯达尔的研究打算展开到一些不切实际的领域，他的确无法像介绍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三大原型大学那样全面细致地描述其他七十所大学。此外，我们应当了解，当拉斯达尔在开展其著述工作时，剑桥得到了本校历史学家远远超出牛津的慷慨关注。默林杰 1873 年提出的“文化史观”为英国的文化史和

^① 邓斯·司各托，约公元 1270—1308 年，苏格兰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早年曾就读、任教于牛津大学。他的学说被称为司各托主义，曾与托马斯主义长期对抗。著有《巴黎论著》《牛津论著》等。——译者注

教育史研究设立了一个新的研究标准。威利斯 (Willis) 和克拉克 (Clark) 的《剑桥大学及诸学院建筑纪念史》——其历史价值正如拉斯达尔所指出的“绝不仅限于建筑学方面”——出版于 1886 年。在 1381 年的那场骚乱中,剑桥大学的档案文献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使得其在暴乱之前的历史档案无可挽回地丢失了,因此有关剑桥早期历史的研究一直都逊于牛津。只有 1381 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与牛津的差距才逐渐得到弥补。在斯坦利·里斯 (Stanley Leathes) 爵士和玛丽·贝特森 (Mary Bateso) 爵士的先后整理下,两部剑桥《教皇恩典敕书集》得以出版,这对我了解剑桥大学早期机构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剑桥也像牛津一样,向世人展示了保存在储藏室里的那些中世纪重要历史资料。如拉查姆 (H. Racham) 先生编辑的早期基督学院法令以及劳埃德 (A. H. Lloyd) 对同一所学院早期历史的记录,都是颇有价值的文献。另一个令人期待的事件则是:尽管亚特华德 (A. Atwater) 先生在彭布洛克学院法令的研究工作尚未圆满完成之前便不幸离世,但他所做的工作却业已相当的完整,足以形成又一部杰出的剑桥历史研究。在早期的学院史著作中,无论是剑桥的还是牛津的,都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就是大家都忽略了学院财产的管理史以及所有与经济 and 财政相关方面的历史。比如剑桥的圣约翰学院史就没有将这项工作纳入研究范围。直到 1511 年,关于学院财产的记录才开始流传,因此亨利·弗雷瑟·霍华德 (Henry Fraser Howard) 爵士在其新近出版的那本值得后人追随的著述《剑桥大学圣约翰福音学院财政记录,1511—1926》中,也是将研究的起始时期定位于 1511 年;与此同时,这部著述的出版也弥补了英国学院财政史研究的缺失。事实上,我们只有对牛津与剑桥大学作为拥有地产的法人组织来对待,并全面掌握学术、经济活动,才能对中世纪学院组织的环境和运行方式进行恰当的理解。值得欣慰的是,牛津和剑桥都拥有自己的档案室,其中保存着十分丰富的相关文件和资料。

A. B. Emden(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德堂负责人)

目 录

序(A. B. Emden)	
第一章 牛津大学及其诸学院的起源	1
第二章 牛津大学组织建构的发展	29
第三章 大学与城市	48
第四章 大学与教堂	70
第五章 牛津大学的教学与研究	88
第六章 牛津诸学院	107
第七章 牛津大学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的地位 ...	148
第八章 剑桥大学的兴起	166
第九章 剑桥诸学院	175
第十章 中世纪大学的人口	192
第十一章 中世纪大学的学生生活	202
附录1 中世纪欧洲大学城	277
附录2 中世纪欧洲大学一览	278
本卷术语	280

第一章 牛津大学及其诸学院的起源

如我们所知,所谓巴黎大学与查尔斯一世(Charles the Great)的巴拉丁学校(Palatine Schools)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因此,后人们不禁由此产生联想:牛津大学的起源究竟与阿尔弗雷德一世(Alfred the Great)有无关系?基于这个疑问,人们开始对相关的历史资料重新进行发掘和考查。牛津神话早在阿塞(Asser,圣戴维德主教)笔记中,就长久以来被人们所认同。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则信息既不是在现存的手抄本,也不是在早期的印刷品中发现的,事实上其初次问世是在1600年卡姆登(Camden,威斯敏斯特学院院长)的《大不列颠》一书中。此后三年,它被阿塞主教出版。¹事实上,该文件做作的古典风格泄漏了其伪造本质。早在1843年,休伯(Huber)在《英国大学》一书的英译本后记中就戳穿了这个骗局,^①但真正的致命一击还是出自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er)先生之手。²在帕克先生对此事件不懈努力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班克的亨利·塞威尔(Henry Savile)爵士^②负有严重的爱国式学术造假嫌疑,而杰出的卡姆登先生也并不是那么毫不知情地在他的书中插入了这则材料。当曾经的权威——阿塞被放在了审判席上时,阿尔弗雷德传奇的确切日期,即使是最简单、最不加修饰的形式,

① 之前托马斯·怀特先生(*Archaeologia*, xxix. 192)就曾呼吁对牛津大学历程的传奇色彩进行关注,但第一个明确指出此问题的是Lapenberg的*Gesch. Von England*, Hamburg, 1834, i. 339 sq.

② 区别于更为著名的默顿学院舍监、伊顿公学教务长亨利·塞威(Henry Savile.)



阿尔弗雷德一世(Alfred the Great)

都不会比拉尔夫·海登^①的《编年史汇编》追溯得更远。事实上,这个广泛传播的故事的核心内容为:在大卫王时代,特洛伊城沦陷后,特洛伊人布鲁特带领一批希腊学者来到了迈普里克国王治下,并在威尔特郡的格里克雷德(Greeklade)或科里克雷德(Cricklade)组建了一个学者机构。后来,这个学者团体迁徙到牛津,从而造就了牛津大学的诞生。由于浓烈的传奇色彩,再联想到人类思想的臆想本性,这个故事真实性基本上已被现在的学者们所否定。

由于布莱恩·塔恩(Bryan Twyne)与安瑟尼·伍德(Anthony Wood)等人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郑重其事地呈现了这一经过精心伪装的历史典故,并意欲在这个精心编制的虚构历史网络中追溯牛津历史起源的真实之线,其笔触的虚弱无力便可想而知。这种无奈,甚至连帕克先生对于早期牛津城历史研究的智慧之光也几乎不能弥补。事实上,我们可以肯定地宣称:在现今地址上的牛津城的发展,或者其历史上任何一种大规模的迁移,都远远晚于罗马共和国时代。圣弗里茨瓦德(S. Frideswide's)的传说似乎提供了研究早期牛津历史的资料,甚至其还可以装扮成牛津存在的历史性证明。但这则故事同样被帕克斥责为是同阿尔弗雷德传说一样纯属杜撰的传说。阿尔弗雷德传说也可被称作为:“狄丹奴斯国王以及他的祭司女儿,以及后来她被邪恶的莱切斯特国王迫害的故事。”国王及其使节充满悬念的失明,圣女祈祷后宾塞地区忽然涌出的泉水……这一切都定然会被人们看作充满

^① 拉尔夫·海登(Ralph Higden),1280—1364,英国编年史作家,切斯特圣温伯格修道院教士。——译者注

传奇色彩的神话传说。但我们大致也能从这些传奇中检拾到一些历史真相的碎片,同时也因此可以推断出牛津城的创造者应当是来自公元732年圣弗里茨瓦德修道院的修士团。这座院舍的建立(无论是否确切地建立在当前的基督教堂地址)却是修士团甚至后来的城镇存在的最早的推定证据。^①有关牛津早期历史的第一则确切记录,应当是公元912年才出现于盎格鲁萨克森(Anglo Saxon)编年史中的爱德华一世“占领伦敦、牛津及其属地”事件。³帕克先生的推论认为,正是由于这次契机,牛津城第一次得到了扩展。与此同时他还在希尔城堡(Castle Hill)找到了唯一保存至今的10世纪的牛津遗迹,以及另外一个确定曾经有过大量建筑群落的核心地点。⁴

据我们所知,11世纪的牛津开始成为英国立法司法机关集会以及基督教会议员选举的常驻地址。但在此之前,我们则无法找到更多关于这座城市的资料。尽管我们并非在对这座城市而是对这所大学的历史进行探究,但上述历史事实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从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中找出适用的内容。至此我们必须要对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进行回答:为何在众多的城镇中,牛津能够成为英国最古老、最伟大大学的所在地?纵观基督教的教会历史,牛津一直都是一个微不足道、毫无历史光环的城市。它并不是主教辖区中的重镇,牛津最早的一所教会机构首先是一所女修道院,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修士学院,最后演变为奥古斯丁修道会牧师的小修道院,而现今在此位置上占据的则是一座基督教堂。上述所有教会机构与阿宾顿(Abingdon)或者格里斯顿伯里(Glastonbury)富丽堂皇的大修道院相比,都像是一个贫穷而平凡的乡下小子。1074年的牛津占领者、治安官罗伯特·奥伊利(Robert d'Oilly)和罗杰·埃弗利(Roger d'Ivry)修建的圣约翰学院城堡牧师会教堂,同样也是规模很小的建筑。⁵甚至庄严的奥森奈(Oseney),也只不过是一所修建于1129年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第二等级的建筑,而西多会的鲁利修道院(Abbey of Rewley)也是直到牛津大学出现以后才崭露头角的。一般来说,在牛津创建一所大学

^① 没有任何资料和可信的记录能够证实修士团的存在。圣弗里茨瓦德教堂首先以教区教堂的面目现世,后来却长期为律修会所占据。见:S. R. Wigram(O. H. S.),i. 2, and the article by Dr. H. E. Salter in A History of Oxfordshire(V. C. H.),ii. 97.

机构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其地理和气候上的优势：淳朴的民风、有益身心的新鲜空气、丰富多样而价格低廉的食物等，这些都有益于学生们的身心健康。中世纪的作家们在谈及巴黎气候时用尽了溢美之词，而同剑桥一样完全被一江绿水所环绕的牛津，同样在气候和环境上也是独领风骚。除气候因素外，丰富而廉价的食物也可能是另外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而能够成为由多所机构所组成的大学城，另外一个实质性的必要因素就是学生就读的便利性。由于处在英格兰中心地带的地理位置，牛津长期以来就被规划成一个便捷的会场，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来自全英的与会人员参加政务会议，同时也吸引着各地学生和教师前来参加学术活动。牛津市坐落在埃塞克斯（Wessex）和麦西亚（Mercia）（联合王国南部最大、最重要、文化氛围最浓厚的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接处，它与伦敦之间交通便利，同时也与欧洲大陆遥相呼应，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南安普敦地区^①所有其他重要城镇都无法媲美的、既能接纳远在北方的学生又同时被遥远的西方学子所青睐的佳址。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处于英国最大水路泰晤士河的河道上。因此，这座城市所处位置的战略意义促使占领者修建了现在的牛津城堡和塔楼。迄今，这些建筑仍是最能打动乘坐火车来牛津参观的游客们的历史景观。随后，占领者又修筑了厚实的城墙，至今它们依然能够为牛津校园增添独特的魅力，同时也给予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以无与伦比的愉悦感。关于牛津优越的地理位置，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缘由就是丹麦的最终衰落成就了其迅速崛起的商业重镇地位。尤其是在12世纪初期之后，牛津城早早地就被犹太人选为商业中心，这也很好地证明了以上观点。⁶简而言之，牛津必须承认自己学术重镇的地位源于一种偶然的地理因素。

当然，仅凭以上论据就断定英国最古老、最伟大的大学就必然诞生于牛津而非其他地点，也是一种荒唐的说法。但我们也必须了解一点，即优越的地理的位置也是产生伟大的大学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

^① “南安普敦”和“北安普敦”的两个前缀充分证明了牛津业已获得的中心位置。见 J. E. D. Cover, A. Mawer, and F. M. Stenton, *The place-names of Northamptonshire* (Engl. Place-name Soc., Vol. x), Cambridge, 1933, p. xix. 南北安普敦由一条中世纪史上最著名的线路连接起来，这条路穿越 Brackley, Oxford, Newbury, Whinchurch 以及 Winchester 等地区。